

阮清越《同情者》的饮食叙事研究

李明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DOI: 10.65285/RWYSHKX.V2I4.009

摘要: 阮清越是著名的美籍越裔作家、学者，也是当代亚裔美国文学的重要领军人物。他的长篇处女作《同情者》凭借卓越的艺术成就荣获2016年普利策小说奖。在这部宏大的历史政治叙事中，饮食书写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本文以新物质主义和生态叙事学为主要批评视角，将食物视为具有能动性的物质行动元，深入研究其如何介入小说的形式与内容建构。通过将食物视为具有能动性的物质，本文不仅拓展了对《同情者》的文本解读，也为理解流亡文学中物质、身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纠缠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 阮清越；《同情者》；新物质主义；饮食叙事；物质能动性

A Study of Food Narratives in Viet Thanh Nguyen's *The Sympathizer*

Mingjuan Li

Xidian University

Abstract: Viet Thanh Nguyen is a renowned Vietnamese-American writer, scholar, and a leading figure in 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His debut novel, *The Sympathizer*, won the 2016 Pulitzer Prize for Fiction for its outstanding artistic achievement. Within this grand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narrative, food writing occupies an indispensable position. This paper adopts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s of New Materialism and Eco-Narratology, treating food as an agentive material actant to deeply investigate how it interven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ovel's form and content. By approaching food as agentive matter, this paper not only expands the 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ympathizer* but also offers a new theoretical le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 entanglements among matter, body, and ideology in diasporic literature.

Keywords: Viet Thanh Nguyen; *The Sympathizer*; New Materialism; Food Narrative; Material Agency

前言

越南战争及其引发的流亡浪潮，不仅是二十世纪后半叶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也成为当代亚裔美国文学持续书写的核心母题。在众多试图再现这段历史的作品中，美籍越裔作家阮清越的长篇处女作《同情者》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与深刻的历史洞察力脱颖而出，荣获2016年普利策小说奖。小说从一名潜伏在南越军中的共产党双面间谍的视角展开叙述，揭示了战争、流亡与身份认同的复杂纠缠。在这部宏大的历史政治叙事中，饮食书写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位置。

然而，既有研究对《同情者》的探讨，多集中于后殖民主义、创伤理论或记忆研究等宏观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存在明显的“重精神轻物质、重符号轻本体”的局限。唐伟胜将物叙事研究分为三种模式，即符号的物、行动者的物与本体的物^[1]。以此观之，既有研究多停留在第一种模式，倾向于将小说中的食物简化为某种族裔或情感的文化隐喻，而对其气味、口感、质地等物理属性所蕴含的叙事能动性关注不足。刘启平在分析谭恩美的《灶神之妻》时指出，食物不应被视为被动的文化符号，而应被理解为“有故事的物”，一种具有能动性的物质力量，它不仅塑造人物的叙述，本身也构成一种话语^[2]。

基于此，本文引入新物质主义理论视角，尤其是简·本内特提出的物质能动性概念，以及马尔科·卡拉乔洛的生态叙事学框架，聚焦于行动者的物与本体的物这两种模式，从情节构建、人物塑造和主题的物质化三个层面，探讨《同情者》中的饮食叙事如何以其不可化约的物质性深度介入文本的意义生产。

一、食物与情节构建

《同情者》的叙事结构以其非线性著称。小说以主人公在再教育营中撰写检讨书为框架，通过他的回忆不断在过去与现在、越南与美国、战争与流亡之间来回跳跃。这种碎片化的时间结构并非纯粹的形式实验，而是与食物的物质属性密切相关。新物质主义强调，物质并非被动的背景，而是具备生机与活力的叙事行动元，能够以自身物性参与意义生产。卡拉乔洛进一步指出，叙事中的物质锚点能够在情节脱离人类目的论的线性逻辑时，帮助读者在多重故事线中把握方向，为碎片化的经验提供感官层面的连续性^[3]。在《同情者》中，食物虽不具备人类的语言能力，却依靠气味的弥散、口感的唤醒、物理形态的介入，打破了线性的时间逻辑，成为推动叙事在战争、流亡、监禁等不同时空之间自由跳跃的物质锚点。

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例证，是主人公在将军夫人家中

吃到的那碗河粉：“夫人的河粉仿佛把我化为轻云淡雾，让我穿越时空，回到了母亲的厨房……飘漾的汤香撩逗着我，考验着我的意志力……我吃着夫人的河粉，时不时忍不住停下来，不只是品尝汤的味道，更在回味记忆里牛骨髓的味道。”^[4]

本内特指出，食物具有诱导人类情绪、社会性模式和心智状态的能力^[5]。河粉正是以其气味直接激活了叙述者的情感记忆。河粉的汤香与茴香味并非中性的感官信息，而是直接触发了一段跨越十余年的记忆：主人公被拉回到母亲的厨房，想起自己“守在熬着的牛骨汤旁，随时清除汤沫”的童年场景。食物与语言是人类最早习得、最难改变的文化特征，童年时期吃的食物永远定义了熟悉与舒适^[6]。触发主人公童年记忆的并非食物的视觉形象或文化意义，而是其最具体的物质属性：气味与味道。新物质主义理论强调，物质的施事能力恰恰源自其不可化约的物理特性：气味分子作用于嗅觉神经，绕过理性思维的过滤，直接激活大脑中储存的情感记忆。在《同情者》中，河粉的气味正是以这种方式，将流亡美国的现在与越南童年的过去压缩在同一个感官瞬间，实现了时间的非线性跳跃。刘启平在对谭恩美《灶神之妻》的分析中指出，食物以其物质属性见证了女主人公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并穿越时空将不同世代连接起来^[23]。《同情者》中的河粉同样以气味为媒介，完成了类似的时空折叠功能，印证了食物作为物质锚点在线性叙事中的核心作用。

二、食物与人物塑造

食物不仅是维持肉体生存的营养来源，更拥有建构主体性的能力，通过物质渗透与生理反应介入人物的内在与外在特征，成为身份流动与伦理生成的物质同谋。食物参与的不只是身体的代谢，还有对杂糅身份和政治伪装的具身刻画。

食物首先通过生理同化参与了主人公“双面人”身份的建构。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法越混血儿、双重间谍、流亡者，“我是个间谍，是个卧底，是个‘内鬼’，是个双面人。我还是个有两套思想的人”^[4]。这种精神上的分裂与兼容，在小说中首先通过饮食行为得到物质化呈现。主人公在将军别墅与克劳德对饮时，同时饮用田纳西波旁威士忌与搭配越南鱼露的菜肴。威士忌象征着他所受的西方教育及对美国文化的精通；鱼露则是越南饮食的灵魂。帕西多莫区分了主导性的食物想象与颠覆性的食物想象，后者能够关注被前者遮蔽的历史与现实^[7]。《同情者》中的鱼露正是这样一种颠覆性的食物想象：它以刺鼻的气味在美国文化的感官边界上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族裔防线。威士忌与鱼露本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风味体系，但主人公的身体却同时接纳了它们。他的胃成为一个开放的物质聚合体，为他的精神分裂提供了物质基础。在新物质主义视域下，主人公“有两套思想”的能力，首先是在他的胃里被确立的。食物是身体离散容器的日常破坏者，它不断提醒我们，自我与他者、公共与私密的范畴是容易被逾越的，因而也是

不稳定的^[8]。在《同情者》中，威士忌与鱼露在同一胃中的共存恰恰构成了这样一种逾越：它将东方与西方、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抽象对立，还原为一次具体的、不可否认的消化事件。主人公并非先有分裂的精神、再通过饮食将其象征性地表达；恰恰相反，是他的胃，这个能够兼容异质食物的物质器官，为他的“双面人”身份提供了最原初的、前反思的物质基础。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恐怖的权力》中提出，卑贱物是那些既非主体亦非客体、既非内部亦非外部的东西，它从身体的边界处涌现，引发恶心与排斥，从而确立自我与他者的界限^[9]。在《同情者》中，食物恰恰以其卑贱的形态，即发霉的、腐烂的、令人作呕的物质，突破了主人公的心理防线，将他作为“同情者”的悲悯内核暴露出来。小说中最具冲击力的例证，是主人公在暗杀酒仙少校之后所吞咽的橙子。在行动之前，主人公与邦在唐人街购买了一网兜“脐眼往外突”的橙子。暗杀结束后，两人回到公寓，吃完三个脐橙，便上床睡觉了。然而，主人公无法入睡：“我躺在下铺，闭上眼睛，感觉脑袋像一间屋子，思想像屋里重新布置的家具；在这间屋里，我磕磕碰碰，见到的东西让我不寒而栗。睁开眼，也是如此。无论闭眼还是睁眼，我总能看到：酒仙少校的第三只眼，因为看清了我的为人，在流泪呢”^{[4]129}。在这里，橙子的“脐眼往外突”的外观，在暗杀的语境中被赋予了诡异的意义：它成为了“第三只眼”的视觉预兆，成为了少校额头上弹孔的象征。更为关键的是，主人公在杀人之后需要吃东西，需要通过进食这一最基本的生理行为来确认自己还活着、身体还在正常运转。然而，他吞咽的橙子却以其令人不安的形态：一个长着“眼睛”的水果，将暴力与死亡带入了他的身体内部。这种进食不再是享受或维持生存，而是一种强迫性的、近乎自虐的仪式：他强迫身体继续运转，但身体却以不寒而栗和无法入睡作为回应。食物的物质性：橙子的形状、被剥开时的汁液、被吞咽时的触感，与暴力的记忆发生了不可分割的纠缠。主人公的身体通过进食记住了少校的死，并通过消化过程中的不适向他发出了伦理的警报。这种警报不是来自理性或道德观念的层面，而是来自最原始的生理反应：恶心、失眠、寒栗。身体以其自己的方式知道了什么是不可接受的，而正是这种知道，构成了主人公作为“同情者”的核心：他无法像真正的冷酷间谍那样对杀戮无动于衷，他的身体拒绝遗忘，拒绝将暴力正常化。

三、食物与主题的物质化

食物不仅仅只是满足口腹之欲的消费品，而是如同真理检验者一样拥有表征宏大议题的能力，通过物质属性（气味、口感、消化反应）承载族裔记忆与政治幻灭的真相，成为流亡历史与意识形态实质的具身见证者。食物作为物质行动元，呈现的不仅是生存状态，还有对族裔认同、国家神话及革命修辞的深度解构。

食物首先通过感官刺激行使唤醒的权力，在异国语境中激活被压抑的族裔记忆。在《同情者》中，没有哪一种

食物比鱼露更具这种功能。主人公在写给姑妈的信中，用近乎狂喜的笔调写道：“啊，鱼露！我们多想吃到鱼露啊，亲爱的姑妈，菜肴不加鱼露，味道有多么不正；我们多想再看看富国岛上规模庞大的酿造园，多想看看一排排盛满上等鲷鱼鱼露的大桶！”^{[4] 86}。这段文字说明，鱼露远非普通的调味品，而是故乡的物质化身，是流亡者与失落世界之间的最后纽带。更为关键的是主人公对鱼露气味的分析：

“外国人认为，那种颜色深如墨鱼汁的浓烈调味汁的气味极其难闻，颇多诟病。为此，英语俗语‘there’s something fishy around here’有了新含义，亦即‘周围有越南人’。就如同特兰西瓦尼亚村民，为了驱走吸血鬼穿挂蒜瓣，越南人用鱼露抵挡那些西方人”^{[4] 86}。在新物质主义的视域下，鱼露的气味分子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它们不依赖任何符号系统，仅凭其不可否认的物质存在，便能在异国空间中开辟出一块属于越南的感官领地。文学中食物话语的运用是一种可以嵌入他者化过程的技术，有助于建构身份^[10]。鱼露的气味之所以能够成为族裔边界的物质性标记，根本原因在于食物在跨文化接触中始终扮演着他者化的工具。鱼露的气味分子不依赖任何符号系统，仅凭其不可否认的感官冲击，便能在异国空间中开辟出属于越南的感官领地。它既是一种嗅觉屏障，成功抵挡了试图同化越南文化的外部力量；同时，它也是族裔记忆的触发器。主人公正是通过鱼露的这一物质能动性，在文化同化的洪流中坚守住了族裔身份的边界。

再教育营口粮的木薯与鼠肉戳破了革命的崇高谎言，间接批评了革命的虚伪性。虽然小说对再教育营中饮食的直接描写相对节制，但木薯与鼠肉这两个意象的出现，足以揭示革命胜利后普通人所面临的物质现实。木薯是一种粗粝、寡味、难以消化的块根作物，通常是贫困线以下人群的果腹之物；鼠肉则更是被视为卑贱的食物，在正常情况下几乎无人愿意食用。然而，在再教育营中，这些却成为了主人公的日常口粮。革命曾经许诺的是独立与自由，然而，在革命胜利后的再教育营中，等待主人公的却是木薯、鼠肉以及被强制撰写的检讨书。木薯的粗粝、鼠肉的恶心，以一种无法否认的生理痛感，揭示了革命的另一面：当崇高的话语落实到具体的物质生活时，它可能带来的不是解放，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匮乏与屈辱。主人公被迫吞咽木薯与鼠肉的消化系统，他的身体成为了革命修辞的终极检验者。在新物质主义的视角下，这不是对革命的道义批判，而是对革命作为物质实践的检验：一种意识形态是否真正解放了人民，最终要看人民吃什么、怎么吃、能否吃饱。从这个意义上说，木薯与鼠肉以其最卑贱的物质形态，嘲弄了那些脱离了物质基础的革命修辞，间接批评了革命的虚伪性。当革命者高喊独立与自由时，他们给予追随者的却是连最基本的尊严都无法保障的口粮。

结语：

食物在《同情者》中是一个具有能动施事力的非人类

叙事者，以鱼露、冷冻食品、木薯等多种形态出现，通过物质属性深度重塑了小说的叙事结构与意义。首先，在情节上，食物发挥了结构性功能。它作为物质锚点打破线性时间，利用感官记忆重构历史；同时作为物理媒介（如糯米饭）编织情报网络，直接推动故事演进。其次，在人物塑造上，食物参与了主体性的建构。它是主人公伪装身份的同谋，通过饮食杂糅具象化了其双面人特质，并确立了其同情者的悲悯内核。最终，这些功能服务于主题层面的深层表达。食物作为检验真理的物质证明，通过嗅觉坚守族裔身份，利用冷冻食品的平庸解构美国梦，并借由木薯与老鼠肉的卑贱真相嘲弄革命修辞。阮清越借此将抽象的政治历史转化为具身的物质真实，深化了对流亡与意识形态的文学反思。

参考文献：

- [1] 唐伟胜. 物叙事研究的三重维度[J]. 外国文学, 2023(1): 12-29.
- [2] Liu, Qiping. “Food as Storied Matter: Reading Amy Tan’s *The Kitchen God’s Wife*.” *Food and Literature*, edited by Gitanjali G. Shahan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1-15.
- [3] Caracciolo, Marco. *Contemporary Narrative and the Spectrum of Materiality*. De Gruyter, 2020, pp. 28-29.
- [4] 阮清越. 同情者[M]. 陈恒仕,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 [5] Bennett, Jane. “Edible Matter.”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5.
- [6] Gabaccia, Donna R. *We Are What We Eat: Ethnic Food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6.
- [7] Passidomo, Catarina. “Gastroimaginarie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Food History*, edited by Jeffrey M. Pilch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4.
- [8] Lotz, Molly Mann. “Food and the Public/Private Body in Nella Larsen’s *Passing*.” *Significant Food: Critical Readings to Nourish American Literature*, edited by Jeff Birkenstein and Robert C. Hauhart,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24, p. 161.
- [9] 克里斯蒂娃, 朱莉娅. 恐怖的权利: 论卑贱[M]. 张新木,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10] Chambers, Mary-Lynn. “Cultural Dichotomy Crafted through Food in Willa Cather’s *My Ántonia*.” *Significant Food: Critical Readings to Nourish American Literature*, edited by Jeff Birkenstein and Robert C. Hauhart,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24, p. 221.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编号：YJSG26010。